再談商周族徽中的「冊」字*

風儀誠

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族徽為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中最常見的內容，而族徽中「冊」字經常出現。有關此字在族徽中的意義，目前學術界比較公認的說法是說，用帶「冊」字的族徽的家族應該是世襲擔任「作冊」一職的家族。可是，筆者認為目前公佈的出土文字資料不夠充分地證明這一說法。其實，也不能排除另一種說法。早在宋代就有學者提出過，這種「冊」字可能跟「冊命」或「賜命」有關係。這種說法很可能更符合我們從甲骨文和金文中可以了解到的社會背景。

關鍵詞： 金文 族徽 冊命

再談商周族徽中的「冊」字

---

* 本文主要內容原在 2009 年在「鳳鳴岐山——周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中首次介紹。此時，收到參加會議的學者的珍貴意見。此外，最近本刊的匿名評審者也提出不少極有價值的評論。雖然筆者未能完全答覆各位所提出的問題，可是還要在這裏對各位表示深深的感謝。

近幾年來出版了不少專門討論族徽問題的論文和書籍。¹ 著作中，大多數作者均提出了一種說法，即商周銅器上族徽中的「冊」字就是「作冊」的省稱或縮寫。近期，支持這個說法的人通常會引用張懋鎔先生 2000 年在《文物》雜誌發表過的一篇文章。² 在這篇文章中，張先生對「冊」字在族徽中的作用有很詳盡的解釋。他特別指出「冊」（同於「亞」、「子」字）在族徽中有着特殊的作用，不能理解為族氏名，而應為「附加式的非族徽文字」。我們同意這個說法。張先生還認為如果某一個族徽中出現「冊」字就說明該氏族為作冊世家。為此從金文資料中找出了 8 個例子證明族徽中的「冊」字與器主人的官職有密切的關係：作冊匱卣（集成 5400）、作冊般鬲（集成 944）、作冊矢令簋（集成 4301）、作冊大方鼎（集成 2759）、作冊折尊（集成 6002）、豐卣（集成 5403）、癸盃（集成 4463）、寢農鼎（集成 2710）。前五個例子族徽中的「冊」字與「作冊」同銘出現，而後三個例子雖有族徽中的「冊」字但不見有「作冊」一詞，不過從銘文的內容作者可以推測均與作冊有關。

此外，張先生也認為族徽中的「亞」字同樣指的是一種職官，而且很可能是武官，另外，子字所代表的應該是一種爵稱。³ 此後，何景成先生又找出「賈」、「臣」、「田」三種其他「附加式的非族徽文字」。總之，兩位學者認為附於族徽的「冊」、「亞」、「賈」、「臣」、「田」都是一種職官性的標誌，而這些族徽所代表的家族應該曾經有人擔任過相關的職官。⁴

上述說法有一定的說服力，不過筆者認為還存在可以商榷之處，因此就寫了以下小文。

首先可以強調的是族徽中的「冊」字比較常見。據目前公佈的

1 詳細情況可以參考張懋鎔：〈一千年來商周銅器族徽文字研究述評〉，《新史學》（臺北），第 18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頁 157-189；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 年）頁 1-15；以及雒有倉：〈商周族徽文字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中國史研究動態》2008 年第 2 期，頁 2-10。

2 張懋鎔：〈試論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獨特的表現形式〉，《文物》2000 年第 2 期，頁 46-51。又收入《古文字與青銅器論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7。

3 何景成先生認為族徽中的「子」不是一種爵稱而應該是一個族氏名。

4 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頁 68-69。

資料，包含「冊」字的族徽銘文應該有 300 件左右，其中一半以上屬於商代晚期，其它的可以歸於西周時期。數量相當可觀，由此看來對當時的人來說，那個「冊」字所表示的東西應該是很重要的。⁵ 與以上提到的其它職官性的標誌相比，包含「冊」字的族徽銘文數量略低於有關「亞」字的銘文，但遠遠超過有關「賈」、「臣」和「田」的銘文。

作冊在古代是很重要的職官。不過，也有與它同等重要的，甚至更為重要的職官。如商代出土的文字資料有：宰、史、小臣、尹、卿事、馬等官名，雖然「史」字在族徽中很普遍，可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應該把它解釋為族氏名，2005 年出版的《滕州前掌大墓地》發掘報告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在如此規模的大墓地以「史」字為單字族徽大量出現，只能把「史」字解釋為當地貴族家族的族徽（即族氏標誌）。⁶ 此外，把族徽中「臣」字看為小臣簡稱的說法目前還沒有被學者們廣泛接受，而且相關資料也比較有限，無法與「冊」字的情況相比。⁷

以上提到的這些官名，在甲骨文中有的非常常見，可是在幾萬片甲骨文中「作冊」這個詞只出現了 2 次，而兩個「作冊」都刻在龜腹甲的背面（合 5658 反、合 1724 反）。而且兩次上下文都特別簡單，對於了解作冊當時的地位沒有太大的幫助。因此可以說，雖然作冊的地位在商代可能很高，但我們在甲骨文中找不到任何根據。

在商代晚期和西周，作冊經常會出現在金文中，出現的背景主要是在賞賜或冊命銘文中。主持這種儀式的經常就是國王本人，不過有時候可以由高級官員主持。據初步統計商代主要賜賞主持人

5 僅《殷周金文集成》一本書中就收集 268 件商代和西周的銘文。據劉雨先生和張亞初先生的統計，《殷周金文集成》收集帶族徽的銘文一共有四千幾百條，見張亞初、劉雨：〈商周族氏銘文考釋舉例——摘自《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的資料和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七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31。由此可看，包含「冊」字的族徽佔所有族徽的 5.4% 到 6.4% 左右。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有關史氏族的詳細情況可以看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頁 149-155。當然，該氏族名的來源很可能與史官有關。

7 有關這個說法可以參看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頁 68-69。

有：王（27件）、子（9件）、師（1件）、作冊（1件）。而主要受賞者有：小臣（4件）、寢（3件）、小子（2件）、戍（2件）、宰（2件）、作冊（2件）、服亞（1件）。⁸

根據黃然偉 70 年代末的分析，西周早期賞賜有官階者銘文中的主要賜者有：王（10）、明公（2）、伯懋父（2）、太保（2）、檀伯（1）、檀仲（1）、周公（1）、王姜（1）、康侯（1）、尹（1）；而受賞者有：作冊（6）、小臣（3）、臣（2）、御正（2）、史（2）、宰（1）、士（1）、侯（1）、太保（1）。⁹

從這些個初步的統計，可以得出在商代金文中作冊的地位似不比其他職官重要。在西周早期的銘文中，有關作冊的銘文比商代多，而且比同時期有關其他職官的銘文也多。這可能反映了他的地位比商代要高，不過資料還是很有限，總共只有六個不同的銘文。¹⁰

如果參看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銅器銘文，我們也會發現大多數帶「冊」字族徽的銘文沒有有關器主人的職官的記載。但也應該承認，在少數例外的銘文中器主人的職官是作冊。符合這種情況一共有五個人的器物：作冊矢令、作冊大、作冊般、作冊翻和作冊折。除了作冊般的諸器為商代帝辛時期，其它器物的年代大概不早於康王時期。¹¹ 此外，也有少數例子，族徽中出現「冊」字，不過器主人不是作冊，如：宰梲角（集成 9105），還有，器主人是作冊但銘文中出現的族徽不含「冊」字，如：作冊鬲尊（集成 5989）。這

8 據嚴志斌：〈商代賞賜金文研究〉，《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頁100-103。可惜嚴氏文中沒有提供系統統計的全部具體數字。

9 黃然偉：《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8）。又收入《殷周史料論集》（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頁161-162（圖表廿一）。

10 「作冊」也見於一件商代的玉器上（即作冊吾戈），不過與此相比上文提到的小臣最少見於4件商代的玉器上。有關相關資料請見陳志達：〈商代的玉石文字〉，《華夏考古》1991年第2期，頁64、65-69；賈連敏、姜濤：〈虢國墓地出土商代小臣玉器銘文考釋及其相關問題〉，《文物》1998年第12期，頁57-62；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西韓城梁帶村遺址 M26 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1期，頁9圖13、頁16。

11 有關作冊般可以參考嚴志斌、岳洪彬和岳占偉：〈殷墟新出土青銅器銘文概論〉，《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30-31。有關作冊般諸器的年代，小文原來有錯，感謝劉雨先生的提醒。

些例外雖然不多，可是也應該引起重視。

以上為筆者對族徽中的「冊」字為「作冊」簡稱之說法提出的一些值得商榷之處。可是，如果我們不接受這個說法，那又怎麼來解釋冊字呢？其實，早在宋代已經有人把族徽中的「冊」字與「賜命」或「冊命」聯繫起來。比如，薛尚功在他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就提出這種說法。¹²可惜，在他的注釋中並沒有具體解釋他的看法和根據。不過，今天我們可以在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出不少支持他觀點的資料。

在甲骨文中除了作為祭祀的名字之外，「冊」字也常用於一種詞語：「稱冊」。「稱冊」為商代的一種儀式，與西周的「冊命」儀式應該是有關係的。據《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帶「稱冊」一詞的甲骨一共有 65 片（大多數為第一期卜辭），此外這個詞也見於在安陽花園莊東地出土的一個卜甲上。¹³顯然比有關「作冊」的記載多得多。「稱冊」應該是商代，尤其是武丁時期，貴族生活中比較重要的一種儀式。孟世凱先生在他的辭典中解釋「稱冊」：「即雙手舉冊向王述命。卜辭中的稱冊多與征伐有關。」¹⁴如：「乙卯卜爭貞：沚貳再冊，王從伐土方，受出又」（合 6087 正）。于省吾先生說：「振旅出征，必有冊命」。¹⁵

賞賜和冊命也是商代和西周時期長篇銘文中最常見的內容之一。當時一些貴族為紀念他們受到國王的賞賜或冊命而鑄造了帶銘文的青銅禮器。這裏應該強調的是，禮器并非一般的書寫載體，而是商周貴族宗族中很重要的物質載體（主要用於祭祀祖先），而商代西周時期的整個貴族社會就是以宗族為核心。了解這種背景就可

12 《宋人著錄金文叢刊·初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329（卷 1 頁 13）、頁 330（卷 1 頁 15）、頁 334（卷 1 頁 23）、頁 337（卷 1 頁 29）頁 377（卷 1 頁 100）。

13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1195。在花園莊東地甲骨中「冊」字出現兩次：花 449（「稱冊」），花 477（上下文不明，可能是祭祀名）。

14 孟世凱：《甲骨學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415。

15 于省吾：〈釋再冊〉，《雙劍謔殷契駢枝續編》（石印本，1941 年），頁 13。又收入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3139。

以了解為甚麼早期銅器銘文的主要內容有族徽和祖先稱號兩種。把以上提到的非族徽文字附於自己家族的族徽而鑄在尊貴的青銅禮器上一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應該是為家族和祖先增添光榮。從這個角度來看，何景成先生主張族徽中的「賈」有商賈或賈人的意思，我們很難接受。商代賈人的社會地位有那麼高嗎？而為甚麼對卿事、宰、小臣這種國家大臣沒有同樣的重視？在商代和西周早期作冊的社會地位是否特別高，擔任作冊的人能否覺得在自己的族徽中加上與他們的官職有關的標誌一定會為家族和祖先增添光榮呢？我們上面經提到，至少商代的出土文字資料中沒有發現足夠證據證明作冊的超高地位的資料。唯一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外就是以上提到的作冊般諸器，不過很難以一人之器作為整個商代社會的反映。而在西周早期作冊確是賞賜銘文中最普遍受命的職官之一，不過相關的銘文中很多不見帶「冊」字的族徽，因此「冊」字與作冊的直接聯繫難以成立。其實，商代和西周時期的作冊也是因為受賞賜而鑄造了帶銘文的青銅器。我看，賞賜或冊命才是商代和西周時期貴族都非常重視的一件事。當時的社會是以王族為中心，非王族的貴族只能依靠與王族的經濟、宗教、政治關係來提高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的地位。商代的「稱冊」儀式和西周的「冊命」儀式一樣都是從國王（或者與國王關係密切的其他貴族）手中拿到一種新的權力。在西周中期銘文中受命者所受到的命冊就是證明這個新的權力的一種物質載體。為了紀念這種儀式和他們獲得的這種新的權力，商周貴族鑄造了所謂的賞賜或賜命銘文。筆者認為在這種銘文出現之前（即殷墟第四期以前），貴族習慣用「冊」字附上與自己的族徽作為這種為家族和祖先增添光榮的新權力的標誌。

結語：

族徽中的「冊」字很常見，而且它的用法非常特殊，與其他字有一定的差別。而在金文和甲骨文資料中作冊好像沒有相應的特殊地位。筆者以為很多學者因為受到周代資料的影響把作冊在商代社

會的地位定得太高。此外，商代晚期長篇銘文的主要內容為賞賜儀式，與西周時期的賜命儀式顯然是一脈相承的。商人和周人同樣重視這種儀式而願意把它記載在用以祭祀祖先的青銅禮器上。

族徽使用的時間比較長，從出現到廢棄總共有 300 多年的歷史，正如張懋鎔先生指出，隨著時代遷移的族徽文字與非族徽文字的含義并非固定不變。¹⁶ 因此，筆者認為早期族徽中的「冊」字的意思可能與「稱冊」有關，然後隨著社會和銘文本身的演變，當時的貴族對於族徽的看法也會有所改變。到了西周時期商代貴族後裔在他們的族徽中保留了「冊」字，很可能因為當時「冊」字已經成為他們的族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擔任作冊人對族徽中的「冊」字可能更加重視。其實，作冊這個職官與冊命這種儀式有着很密切的關係。假設「冊」字在族徽中的意義從一個概念轉變到另外一個概念也不足為奇。

同樣可以認為，雖然「稱冊」與「冊命」有一定的關係，不過也應該承認，早期的「稱冊」主要與戰爭有關，而後來的「冊命」涵蓋的範圍就更廣泛，涉及到各種官僚。這是否反映武丁時期的冊命制度與西周時期的冊命制度的差別，還是主要反映資料性質的差別（因為甲骨文和金文反映古代社會的不同方面）？這個問題還難以回答。

族徽的問題非常複雜。目前有一些學者在前輩著作的基礎上正在系統地研究族徽的問題，他們的研究已經得到不少精彩的成果。因為筆者能力有限，這裏對於族徽中「冊」字的問題無法得出一個最終的結論，只能指出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並且提出我個人的意見。

16 見張懋鎔：〈試論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獨特的表現形式〉，又收入《古文字與青銅器論著》，頁 6。

The Character *Ce* in Clan Emblems of Shang and Zhou, Revisited

Olivier VENTUR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Clan emblems are often seen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 and early Western Zhou. The character *ce* is one of these.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is *ce* emblem belongs to a family with a hereditary post of Zuoce, literally those who make edicts. However,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extant excavated source materials are insufficient to support this hypothesis. On the other hand, as early as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s rendered a possible relation of this *ce* to *ceming*, literally conferring a title, or *ciming*, literally giving an order. This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may be more suitable to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at time as attested from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Keywords: Bronze inscriptions, clan emblem, conferment